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刘增人

文化的脐带

——王统照与相州王氏私立小学

这里既有作为文化人固有的情怀与基因,更有对故乡与母校的感恩、报效的自觉——把这位新文学家与故乡、母校紧密联接、维系在一起的,显然是文化的脐带。

1935年,王统照横海欧游,纵览八国之后,经上海、潍坊返回故乡诸城相州。对于相州王氏私立小学这所他童年时代的母校,开始了新一度的热心关注。

1914年春,他因病回家休养,恰值小学的校长、王统照的族兄王统熙因事离职,王统照便自告奋勇,代理该校校长半年,那时他才17岁。他到职仅仅两天,就为全校学生设计、制作了60套灰色的制服和大盖帽,由学校经费支付一半费用,另一半由王统照自己无偿捐赠。15天后,学生们穿上了整齐的服装,精神振奋,朝气蓬勃,使学校充满着生机和活力。学校西大门外偏西处,原有一片荒草洼地、一个死水发酵的水塘。王统照带领师生们利用“劳作课”铲掉荒草,平整洼地,开挖水塘,移植荷花,成为相州的一景。他还自筹资金,雇佣工匠,在荷花池西的高阜上,建造了一座八角凉亭。亭内有圆形石桌,周围安设石凳,草地插上篱笆,建起山门。于是一块满是垃圾、臭水,野草丛生的荒地,变成了学生、村民的公园。此后,他又主持修缮了学校大门,门内左侧新盖了两间门卫室,增建了教室两排,每排15间,盖起了办公室、庶务室,修整了师生宿舍,砌起了操场的界墙,栽植了花草树木,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的面貌。

这次回家,王统照第二天便兴致勃勃来到学校。校长王石佛向师生热情介绍了这位“校友”、从本校走出去的著名新文学家、师生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王统照身穿长袍,金丝眼镜在文静地闪着光芒,先向大家问好,然后有声有色地讲述他游历西欧诸国的见闻,他用爱迪生的名言“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,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”鼓励学生奋发读书。讲话之后,他问学校有什么困难,王校长说学校想建立图书馆,师生也急需图书馆,但苦于无书无钱,非常希望有人支持。王统照爽快地一笑,满口答应帮助解决。回青岛后,他自费购买了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等古典小说及小学生《万有文库》等共约五千多册,用木箱寄来。这就是相州王氏私立小学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(上世



王统照

纪50年代,王统照在济南任职时,还曾用自己的工资为相州小学买过一套铜鼓乐器,可见对母校关切之情)。王校长说,你是诗人,该给学校编写一首校歌。王统照高兴地答应下来,很快写成了歌词,请老师们提出意见后,又做了修改,便请学校的音乐教师石友琪谱曲,定名为“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校歌”:

明白事理,学习技能,中华疾病弱与穷。身体劳动,精神朴诚,做人救国在于功。大家力合心同,做街上的蚁,酿蜜的蜂。你我他,做一个新儿童,做一个新儿童,快乐融融,春日的风筝,春日的风筝。

一天清晨,他在校长王石佛的办公室里看到一摞小学生的作文,信手翻开之后,发现竟然全是自己童年时代就十分熟悉的流传于胶东、鲁中一带的民间传说故事,什么“长虫叠鳖”,什么“铜锣铿锵”,一下子勾起了他深情的记忆。他翻阅后,觉得学生们搜罗比较广泛,文笔也还活泼,既保留了民间传说故事的原有风貌,又带上孩子们自己的想象和趣味,很有出版、传播的价值,

于是请校长组织各位老师,指导学生们扩大收集的范围。最后他选出28篇带回上海,交给正在儿童书局工作的陈伯吹先生。在儿童文学专家陈伯吹的支持下,1937年3月《山东民间故事》一书由儿童书局正式出版。王统照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称:“这些故事在三十年前我就听过不少,家里的老仆妇,常到我家说书的盲老人,为了哄孩子不闹,他们讲述给我听。但谁的年光能够倒流回去!年龄稍大,得用心的事多,又离开故乡那样久了,这些故事的影子在我的记忆里愈来愈淡,渐至于消失得无从记起。那天仿佛把我又牵回童年!繁星闪光的夏夜,凄风冷雨的秋夕,在母亲的大屋里,在姆妈的身旁,听说那些能言能动的怪物,听说那些简单有味的人情,当时何曾有什么教训与警戒的观念,与什么什么的批评,只是一团纯真的喜悦与忧念关心于故事中的人物而已。现在三十几个年头过去了,想不到把忘尽的故事在他们的笔下温回了旧梦……我那时把难以言说的心情沉落在啼鸟与飞絮的庭院里,直待有人喊我吃饭,才将故事的笔记本放下。后来我劝志坚(即王石佛)把这些故事集印起来,不只是可做乡土的教材,也可做民间文艺的探讨。虽然不过在几个县份中流行着,但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样的搜集,我想对于好研究中国民俗学、民间文艺与童话的都大有帮助。”他认为,“集合起一些同地带的民间故事,能够显示出这一带地方的社会状况、地理的环境、民间的理想与艺术——爱慕与憎恶、赞美与怨恨等都很清楚地表现于故事中间。”可惜这建议至今应和者仍然寥寥。

王统照成年以后,大部分时间在北京、青岛、上海等地工作与生活,极少回到相州。但每次返乡,总是尽其所能,为故乡的教育、文化出资尽力。这里既有作为文化人固有的情怀与基因,更有对故乡与母校的感恩、报效的自觉——把这位新文学家与故乡、母校紧密联接、维系在一起的,显然是文化的脐带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、青岛大学教授)

先说一个小故事——

据说,苏东坡本家有个孩子很爱书法,写了就让苏东坡给他看,苏东坡一开始还给他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,后来,这孩子写得很勤,三天两头地找苏东坡,这样,苏东坡就不得不把他的“真经”告诉给他了。苏东坡说:你这样光写不行,你得多读书。

乍一看,苏东坡的这种意见似乎不着边际,一般人往往很难接受。其实,这才是深谙个中三昧的真经呢!

其实,在农村也有挺热爱书法的人,三更灯火五更鸡的,你看又有哪一个练成书法家了?究其原因,就在于他们读书太少,文化功底太浅。举个例子,远的不说,也不了解,就说说我父亲。他热爱了一辈子书法,很迷,在他得了肺癌之后,在我这里住着养病,就在这即将不久于人世之时,他还忘不了书法哩!他的三个闺女来看他,他让她们再

【书法茶座】

书与“书”

□常跃强

来时把家里的纸、毛笔和墨盒给他捎来,他说他要在我这里练字。别的不说,光说这种精神吧,又有谁能达到呢?可是,他弄了一辈子,也没弄成,不过是比一般的人写得工整些,春节写对联时比别人家写得好些,也就是这些,别的,乏善可陈。我好读书,他多次大声呵斥我:别读书读憨了!

他说这话的时候,我已经出了4本书,并有文章被选入课本,可是这些他视而不见,竟说出这样愚昧的话来,笑话!也难怪,他小学毕业,你能要求他什么呢?他在家乡能给那一带人看个病也就不错了。

魏启后先生这人挺好。有一回,我一说我家那块匾“文革”中毁了,他立刻就说:“常老师,我给你重书!写原大的。”写时,光“元化遗风”这4个字,他就写了两遍,直到满意了才交给我。最后,他说:“我给老先生写一幅。”问我父亲的年龄,他就笑了,说:“还没我大哩!”然后,铺纸挥毫,“刷刷刷”,一幅字立马就完成了。因我父亲是医生,所以他写的这幅字是——“花发东垣开仲景,水流河间接丹溪。他写完之后,也许看出来我不大懂,就很耐心地给我讲解了一遍。

魏先生待人和蔼可亲,读的书也多,你和他拉呱,他妙语连珠,风趣幽默,醍醐灌顶一般开启你的愚痴之心,那感觉就像喝了一壶陈年老酒似的,回味无穷,齿颊留香。有一回,我跟老先生去五龙潭参加一个活动,我和他坐在车子的后排座上,前边副驾驶座上坐着我们省里一位声名赫赫的大画家。我们两个说着说着就拉起了陶渊明,他随口就背出了许多陶渊明的诗句,还用极简短的几句话点明了陶渊明的思想发展轨迹。这让我大为惊讶,冷不丁打了一个麻酥酥的战栗,回到家默然良久,好一番感叹!

魏先生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生,后因家庭困难辍学,家居读书,当时启功先生给他来信帮助他安排读书计划,并鼓励他“临二王帖,参以老米笔意,自运有古法,庶几有成”。这就是魏先生始终遵循的从集古到自运,追求创新的道路。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来,魏先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前几天在济南山东大厦听欧阳中石老先生的讲座,他也是特别强调学习,并以通俗的借钱为喻,讲了一个很实在的道理。他对那些天天在那里写呀写的人也不赞成,说他们那是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。

凡是大学问家,他们大都是无意成家而成了书家。鲁迅先生那字,是隶变体,“质朴而不拘挛,洒脱而有法度”,写得好多,多别致,你看他的影印手稿会让你看得爱不释手。茅盾那字写得才有劲哩,我母校聊城师范学院那几个字就是他题的,他那笔道子就跟铁钩子似的,特别来劲!有一回,我问魏启后先生:“茅盾那字是跟谁学的呀?”魏先生不正面回答我,而是说:“他也是看了一些资料。”

当然,这也看各人的手头。比如孙犁先生,他的小行书就挺好。我这里有他给我的十多封信,字像他的文章一样,行云流水一般,让你看了感觉特别舒服。可是他的大字不行,我这里有一幅他赠我的用大字写的一首鲁迅的诗,我也裱了,一上墙,这字的毛病就很明显了,字太肥,显得臃肿而缺少精神。不过孙先生很有自知之明,他在信中说“我不会写字,山东书家如云,一定惹人发笑了,留个纪念而已”。

这正应了我爷爷在世时的一句话:小字写得好,大字写不了;大字写得好,小字跑不了。你看人家沙孟海,大字写得多好,小字也写得颇耐人寻味。沙孟海的书法,连魏启后先生都挺佩服。他说:谁写得好呀,还是人家沙孟海、启功!

文章写到这里,说了不少废话,其实,这些意思,人家苏东坡早就用一首小诗给总结了——

退笔如山未足珍,读书万卷始通神。君家自有元和脚,莫厌家鸡更问人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)

【个人记忆之二】

□吕家乡

矿山惊魂

从此我收起了为怯懦而羞愧的心情,也收起了申诉翻案的想法,只求“老老实实认罪服管,争取早日结束教养”。

1959年春,我们原在清水泊农场的被教养人员迁到王村矿区去从事工业生产。上级还当做好消息宣布:以后写信不必写惹眼的“教养所”了,只要写“王村八三厂”即可(“八三”是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决定的日子)。同时上级在编队时把右派分子相对集中起来,管教方式也有了一些无形的变化。

这年夏天,在王村矿山上,我经历了惊魂的一幕。

我们小组共十几个人,任务是开采和抬送焦宝石。小组分摊了十几米露天矿坑,三四个壮汉在矿坑里用撬棍和镐头开采,其余的人用荆条圆筐或铁皮方盒把矿石抬运到百米之外的窑场。我是抬筐工。抬重筐是上坡,两条腿越来越重;抬空筐是下坡,真想放松一下,但为了赶工效,又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每天都开展“重新做人劳动竞赛”,比赛谁装得满,跑得快,筐用得久,出了几次工伤事故后,又加上一条“不出工伤”。干到烈日当顶,午饭送来了,就在矿山上享用。真的是“享用”。由于胃口奇大,粮食定量不足,饭前我总先喝两大碗糊盐水(糊盐是让家里寄来的),然后把两个地瓜面窝头和一小撮腌地瓜咸菜捧在手里,像吃人参果一样细细品尝。这一顿美餐恋恋不舍地结束了,正想躺下迷糊一会儿,“哪一哪一”哨子急促而粗暴地响起来。我本能地奔向固定的中队集合地点。值星小队长张福明已在吆喝:“各小队以我为基准,成横队集合!”张福明原是我的小组长,几天前才被中队提升为小队长。他曾在志愿军当过连长,在中队大放中成了右派。他个子不高,但精于敏捷,总穿着旧军服,平日干活有质有量,每次中队“点名”都受到表扬。

“立正、向右看齐、报数”之后,张福明以正规的操练姿势向中队长报告:全中队共有若干人,实到若干人,缺席若干人,请中队长指示!中队长淡淡地说:“入队吧!”张福明又以正规的操练姿势跑了几步,站

到了队尾。中队长宣布:“请公安分局×局长讲话!”一位身穿警服的高大魁梧的中年人威风凛凛地跨到队前,立脚未稳就高声叫道:“把那个重新犯罪的右派分子张福明押下去!”

啊,这太意外了!我不得扭头向队尾看去,只见张福明依然肩背笔直,可是黧黑的脸孔已变得青灰。说时迟,那时快,两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警察扑上去,把他的脑袋按下,双臂拧到背后,“咔嚓”地戴上手铐,押向了停在窑场前的警车。

×局长拿出一页纸来,声色俱厉地宣读张福明的罪行,我唯恐漏掉一个字,但听到的只是一些笼统的词句:“借大鸣大放之机向党猖狂进攻”,“在劳动教养期间,仍不思悔改,抗拒改造,恶毒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,与人民为敌”。处罚是具体的:“经上级决定,对张福明延长劳动教养期为七年。”×局长结束了讲话,向警车走去。中队长平静而威严地宣布:晚上各小组学习讨论×局长的讲话,现在开始劳动!

下午抬筐的时候,张福明那长青灰色的脸总在我眼前盘旋。刚才还精神抖擞地喊口令,一转眼就被戴上了手铐。他到底犯了什么新的罪行,以致要蹲七年教养所呢?

一连两周的晚上,我们都以此作为“政治学习”的内容。先是声讨张福明的罪行,然后是相互揭发检举,最后是各人修订“认罪服管,重新做人”计划。每个人都一轮又一轮地发言,发言都基本相同,我也和大家一样。我始终纳闷:张福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?

中队长在做总结时说:有的人想打听张福明到底有哪些破坏言行,这个问题,是你们不需要问也不应该问的。你们要相信党和政府,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,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如果心里嘀嘀咕咕,就是不相信党和政府,这样怎么能够重新做人呢?这番话使我顿开茅塞。我想,这个道理

不仅适用于我们,也适用于张福明本人,如果张福明不服气、态度恶劣,那就会罪上加罪,劳动教养升级为徒刑,甚至再升级为死刑。不可设想的结果都可能在他不知不觉中发生呀!

这样的事是不是会降临到我身上呢?这个联想把我吓坏了。我对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,内心是充满矛盾的,有时觉得罪有应得,有时觉得委屈,有时还责备自己在受批判过程中表现怯懦,不敢批驳那些漏洞百出的批判。我在课堂上讲过一篇课文是季米特洛夫(共产国际领导人)在莱比锡法庭的演说,季米特洛夫置生死于度外,把敌人的审判庭变成了揭露法西斯罪行、宣传真理的讲台,最后大义凛然地声明“历史将宣告我无罪”。我和他面对的对象虽然不同,他的无所畏惧的革命斗争气概却值得我学习。而我只能把“历史将宣告我无罪”的想法藏在心里,从不敢说出口。为此我常常深感羞愧。现在我的想法变了。季米特洛夫毕竟是季米特洛夫,因此才能有可能全文发表演说;而像我这样的蝼蚁之民是没法相比的,现在即使我在睡梦中喊一声“我无罪”,也会有人检举,罪加一等。从此我收起了为怯懦而羞愧的心情,也收起了申诉翻案的想法,只求“老老实实认罪服管,争取早日结束教养”。

几个月后,同组的老王偷偷地跟我谈起张福明来,他说:这家伙说话太随便,大概是无意间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不该谈的一些事情,被人检举了。老王看我表情木然,大概怕我去检举他,赶紧补充说:“他这不是泄露机密吗?罪有应得!”我怕老王检举我,也说:“泄露军事机密,只判他七年劳教,而没有判刑,还是比较宽大的。”

1979年初,我接到了“改正错划右派、恢复政治名誉”的通知,我又想到张福明:如果他还活着,大概也可以改正了吧?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